

香港傳真

(香港)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11-34

2011年6月15日

我們的目標是：節能減排降耗治污調水
—— 兼論“低碳”、“全球變暖”是另一種
“普世價值觀”和“西方中心論”

中國稅務學會 張木生

一、歐美大人物們的“低碳”、“全球變暖”大合唱

30年前，《寂靜的春天》熱銷，我請教中科院院士、英國皇家通訊院士、地球物理所所長、全國人大常委黃秉維老先生，人類活動對自然的影響力。黃老答曰：“極其局部，蚍蜉撼大樹，人定勝天，早晚是個笑話。”

我對氣候問題的關心，只是歷史文化的，科學問題，比較專家之學。

“人類活動導致氣候變暖”學說歷史不長，追溯精神源泉是歐美，北美、英國最突出。

北美源泉是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啟動，後經羅馬俱樂部、綠色和平運動等多路組織發揚鼓吹，可以概括為對於工業文明本身的恐懼，只不過當時的議題是全球變冷，新冰河世紀來臨。

但從 1980 年代起，變冷論改為變暖論，大趨勢掉頭向上。在這股自然道德基礎和相關的恐懼情緒的渲染下，“暖派”得勢，從唱冷變身唱暖，開始組織國際上的“人類活動導致全球變暖”的輿論。這個大彎是怎麼轉過來的，我一直在想，主調總是西方的，換什麼調也是西方說了算。1988 年是個關鍵年。這一年，美國宇航局從事計算機模型模擬的科學家漢森（James Hansen）在美國國會做了一次精心準備的聽證會，證明 1988 年是 20 世紀最熱的一年，室外溫度攝氏 38 度，還不許開空調，這造成了鉅大的影響。而這次會議的兩位組織者之一，正是後來的碳運動政治主將——戈爾。同年，“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成立。而聯合國的一位穿梭於政商兩界的重要人物莫里斯·斯特朗經過十年的反復組織，終於在 1992 年召開里約熱內盧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最重要的主題便是“人類活動導致全球變暖”。從此，國際“碳政治”正式啟動。¹

僅有情感化的“碳政治”是不夠的，還需要“碳科學”來支持。英國適逢其時。二戰以來，英國的經濟一直疲軟，內政扯皮不斷，“日不落帝國”已是昨日黃花，以至於最後在 1970 年代末發生了社會動亂。1979 年鐵娘子撒切爾夫人上臺，枕戈泣血，以求一洗，重塑輝煌，誓言整頓社會經濟秩序。撒切爾夫人在經濟方面的思路主要有三條：一、國有產業私有化；二、發揮英國當時被認為尚存在競爭力的產業，特別是核電技術的優勢，進行經濟轉型；三、金融改革，鼓勵投機賭博金融行業發展。1988 年，撒切爾夫人發表演說，正式將人類活動導致全球變暖當作人類面臨的重大挑戰，並開始大力支持英國研究氣候

¹ 簡練：〈“碳運動”泡沫的膨脹與破滅及中國立場〉，《綠葉》2010 年第 11 期，第 121 頁。

變化的科研機構——東英吉利大學(UEA)的氣候研究中心(CRU)。同時，英國水文局前局長霍頓(John Houghton)出任IPCC主席。

今天檢驗撒切爾夫人當年的三項作為，可以看到英國的私有化並沒有激發英國經濟的雄起，英國的實體經濟持續虛化，核電技術振興不見蹤影。她的系列政策只得到了兩項結果：其一，英國成為“人類活動導致全球變暖”學說與社會運動的全球大本營；其二，除美國華爾街之外，英國倫敦成為流竄在世界的金融資本的聖地，雖然也被美國金融大鱷洗劫過一把。前者讓英國成為碳道德和碳政治大國，後者則為碳金融提供了最好的溫床，如影隨形讓英國成為碳金融大國。而英國工黨在同時期也進行了整頓，疏遠或拋棄傳統工會支持者，主動適應並推動英國經濟虛擬化的進程，與倫敦金融城結盟，同時熱情擁抱碳道德與金融自由化。1990年代上臺的首相布萊爾與首任大倫敦市市長列文斯通就是這樣的典型人物。

1992年，里約熱內盧會議召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通過，而核心團隊來自英國的IPCC則為《框架公約》提供作為國際協商依據的“評估報告”。不過，令IPCC更為頭痛的乃是無法證明目前的變暖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如果這一點不能提供證據，那麼就不能確定20世紀早期和1970年代末~1990年代的兩段昇溫過程必然與人類的二氧化碳排放有關係，而這更可能是自然因素造成的。²

再讓我們將目光轉向美國前副總統戈爾。戈爾在2000年競選美國總統失敗後，成功地將自己轉變為全球環保泰斗，現在時髦的稱謂是華麗轉身，風聲水起。自從戈爾2006年拍攝的紀錄片《不可忽視的真相》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自己也獲得2007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後，反對戈爾的聲音不少，不僅針對戈爾本人，而且針對戈爾宣傳

² 簡練：〈“碳運動”泡沫的膨脹與破滅及中國立場〉，《綠葉》2010年第11期，第122頁。

的溫室效應。³

媒體發現戈爾位於納什維爾市的豪宅面積約一萬平方英尺（約 929 平方米），擁有 20 個房間和八個浴室。而根據美國全國住宅建築商協會的數據，2008 年一般美國家庭新建的房子平均面積大約 2400 平方英尺（223 平方米），不足戈爾豪宅的四分之一。戈爾豪宅每天的用電量是普通家庭用電量的 20 倍以上。

對戈爾的質疑，還不止這些。他們繼續發現，戈爾近年來一方面鼓吹綠色革命，另一方面大舉投資相關的綠色產業。戈爾投資加利福尼亞“銀泉網絡公司”就是個典型例子。美國能源部 2009 年年底推出總額 34 億美元的智能型電力輸送網補助計劃，銀泉網絡獲得 5.6 億美元的採購，僅這項計劃就讓戈爾在未來幾年可望賺到 2008 年投資金額的好幾倍。批評者認為，戈爾將因為政府推行他極力鼓吹的政策而獲利，成為史上第一位“碳億萬富豪”。⁴

“氣候門”、“冰川門”、“亞馬遜門”這些造假門事件，地球人都知道，後面都要涉及，先不贅述。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開始遭遇有史以來最嚴重的信任危機，許多媒體開始把焦點集中在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主席帕喬里身上。據英國《每日郵報》2010 年 1 月 31 日報道，記者發現帕喬里的家距辦公地點其實只有一英里，他完全可以步行，或騎自行車，或者乘坐專為他提供的環保電動車。而滑稽的是，帕喬里家裡總共擁有五輛汽車。⁵

帕喬里工作的研究所與一些企業有金融利益關聯，西方幾十家新聞媒體的曝光，不斷充當揭老底戰鬥隊，面對媒體揭發，西方大人物的謀略是黑不提白不提，揣著明白裝糊塗，良心塞進褲襠裡。讓自己控制的更大輿論把水攪混，以使人們視覺疲勞，久攻於堅城之下，帥

³ 易鵬：《低碳真相》，中信出版社 2010 年，第 161 頁。

⁴ 易鵬：《低碳真相》第 166~167 頁。

⁵ 易鵬：《低碳真相》第 164 頁。

老兵疲。但是，許多環境保護主義者還是認為，作為環保領頭人，帕喬里顯然不該與能源公司有金錢關係。⁶

儼然成為中國常客的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卸任後，對中國表現出了異乎尋常的熱心：在他卸任後的 2008 年、2009 年、2010 年，這位貴客已經先後訪問中國並組織、參與與中國環境有關的公衆活動達 14 次，有案可查的重要來訪有三次。

他還對中國貴州的偏遠農村情有獨鍾，“常回家看看”。

在 2009 年 8 月，布萊爾與央視《對話》節目進行了一次互動，節目名字叫《低碳，進行時》。然而節目裡，微妙的反差出現了，中方代表，主要圍繞的話題都是節能減排降耗治污，我們向老師請教，中國能向西方購得哪些先進技術？而布萊爾則避而不答，他大談其帶來的恐怖災難片，其實只是幌子。當主持人追問“如何能夠做深入的工作”？布萊爾明言：“我們能做的，就是建立碳交易市場”，至於“技術轉讓問題”等“次要”話題，“這是複雜的事情”。

此時，一個組織 Wind Rush Ventures，布萊爾的私人投資基金（以氣候碳匯交易為主），則已經打開了口袋，準備收穫碳金融的豐厚果實（戈爾與布萊爾這兩位碳政治高手，同時也都是碳金融高手。兩人都參與了碳金融相關的金融投資，從相關活動——投資紅利、演講費等——中收穫鉅大。例如戈爾與從高盛出來的金融家布拉德共同籌資的 GIM 基金數額達到 50 億美元）。

是的，碳交易市場，這才是布萊爾來華的真正目的。碳金融，這是來自實體經濟已然基本虛化的“低碳先鋒”國家英國的真實聲音。⁷

昔日的世界工廠和日不落帝國早已是東逝之水，除了金融衍生品，英國為當今世界還曾貢獻了什麼？既老又虛，如何才能實現老牛

⁶ 易鵬：《低碳真相》第 164~165 頁。

⁷ 簡練：〈“碳運動”泡沫的膨脹與破滅及中國立場〉，《綠葉》2010 年第 11 期，第 128~129 頁。

食嫩草、以老擒壯、以虛勝實的目的，薑還是老的辣，延續數百年的西方中心論，人為構造並佔據道德制高地，再與自己最擅長的上層財技相結合，當是維持掠奪食物鏈穩定不倒的一個巧妙攻略。

布萊爾所頻繁造訪中國南方最貧窮的貴州，當然是公關的最佳舞臺，“道德產品”的優良加工廠。中國短短 30 年的改革開放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毋庸置疑，中國政府已成為世界上最有錢的政府。迫在眉睫，刻不容緩地進一步澆注並穩固近代五百年來西方對於東方的“優勢文明”，道德高尚的悲憫佈施關係，鞏固在中國全面發展下已然搖搖欲墜的基本盤。西方輸入中國的“低碳”觀念，已同其所謂的“民主”、“人權”觀念一起，在中國某些人心目中佔據了“普世價值”的地位。既賺得益滿鉢溢，又立了道德牌坊。賺大發了！中國是世界實體經濟的火車頭，中國技術專利已成為世界發展最快的榜首；中國的風能、太陽能產量已成為世界第一；中國的核電起點就是世界的第三代，並且在可控核聚變領域不落後任何國家，在登陸月球後，中國掌握氦-3 後，可以生產真正安全的，最低價的核電。

正因此，這絕不僅僅是一場和個人名聲或利益有關的公關策劃，更是一場文明意義上精神與利益雙重征服的標誌戰役。碳運動，既能為中國經濟的發展設置羈絆，又能讓西方金融資本大發其財，還能讓西方繼續佔據道德制高點，真可謂是一石數鳥。

道路在這裡分叉，一邊是節能、增效 — 建設性的道路，中國的專長：中國的比亞迪，中國的高鐵，中國的低耗能芯片、通信基站，中國的經濟轉型，中國解決了全世界 70% 的貧困人口的生存發展，中國的突飛猛進為人類做出的踏踏實實的貢獻 — 中國主導；一邊是低碳，虛擬手段獲取利益的佈局：英國的禁衛，英國的東英吉利大學，英國的 PICC 核心成員，英國的碳金融碳交易，英國在世界上攝取食物的捷徑 — 英國（及美國與歐洲大陸）主導。經歷了數十年虛化後的大不列顛仍然要在精神上高居霸主，它在 21 世紀的道德變體

不會容許另一個文明憑藉自己的兢兢業業的努力在其中佔據主導地位，更不容許對國際“科學”和道德命題的設定權力提出挑戰。

2009年冬天氣候門事件的發生，標誌著碳運動開始走向低潮，搶在基本面徹底瓦解前獲取最大獵物——中國，可能是碳運動成功的最後希望。2010年，在全世界的“低碳”浪潮正在消退的時候，針對中國的“低碳”公關活動卻高潮迭起，原因正在於此。這邊廂布萊爾的御用 NGO “氣候組織”（The Climate Group）要包攬舉辦 2010 年坎昆會議大量中國官員和企業家的活動；那邊廂，桑德爾的弟子、芝加哥氣候交易所副總裁正在傾力將碳金融引入中國……⁸

改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科技創新，這是中國未來 20 年長期發展的既定方針，目前總體形勢高度有利於中國，歐、日、美各國的傳統技術或者新技術在以不同的形態不斷流向中國，“吸收——再創造”的過程不斷上演。中國自身提高能源、材料效率，保護環境，與西方的“低碳”運動並無關聯。西方“碳社運”的主力軍 20 多年來只是在使用“低碳”大搞宣泄式的社會運動或公關秀，基本沒有做過什麼促進能源有效利用的實事（即使有也基本是非西方國家——日本完成的）。英國和瑞典當年的領導人試圖用低碳來促核能都失敗，主動權反向落入綠色和平之手，被利用來進行社會宣泄製造紊亂。中國的崛起不會得到他們的承認和肯定——2010 年年初香港的高鐵風波，2010 年對於比亞迪的輿論圍剿已經體現了這種心態，這在他們活動中的舉手投足間充分表現。

西方國家給中國開出的現代化藥方是經濟自由化，企業私有化，政治民主化，社會憲政化，發展“低碳化”，能源再生化，好聽，好看，但“衆疑無定國，衆惑無治民”，西方的藥方，我們能照單全收嗎？

中華文明不是那種在掠奪式索取與崩潰式恐懼的兩極之間迴蕩

⁸ 簡練：〈“碳運動”泡沫的膨脹與破滅及中國立場〉，《綠葉》2010 年第 11 期，第 129~130 頁。

搖擺的文明。當瀕臨破滅的“碳泡沫”盯住這個迅速復興的文明，為了自己的延續存在而開始叩關敲門的時候，中國難道會被其一直牽著鼻子走嗎？⁹

“史上最牛的會議”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 2009 年召開，一夜春風來，千樹萬花開，其實只是冬天裡的一把火，“低碳”被無限地放大和傳誦，中國的官產學媒，老少婦孺都被“低碳”。對低碳的各種解讀層出不窮，難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

就在人們面對哥本哈根大會即將無疾而終的最後時刻，2009 年 12 月 18 日 18 時 50 分，躊躇滿志的奧巴馬不顧外交禮儀貿然推開了一扇大門，“闖”進會場，該會場正坐著“金磚四國”的領導人：中國總理溫家寶、巴西總統盧拉、印度總理辛格與南非總統祖馬。¹⁰

集人文關懷，終極關懷，臨終關懷於一身，上臺 11 天就增兵阿富汗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美國總統奧巴馬說：“總理先生，你準備好和我見面了嗎？準備好了嗎？”面對奧巴馬的唐突之舉，溫家寶站起身來，禮貌地表示歡迎他“加入”，一起參與討論。於是四國會議變成了五國商討，並最終取得共識——出臺了一個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力的《哥本哈根協議》。哥本哈根大會最後以有勝於無的低限度協議宣告結束了。

奧巴馬對金磚四國在減排低碳上不依不饒，小肚雞腸銖銖必較。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小道理必須服從發達國家“低碳”的硬道理。發展中國家不是說“不”，而是力爭共識，但發達國家滿意了嗎？

環保人士批評哥本哈根大會十分失敗，除了在資金問題上取得一些進展外，沒有太多積極成果，以發展中國家為主的 77 國集團更是認為協議草案“史上最糟”。“國際地球之友”的主席巴希則說，哥

⁹ 簡練：〈“碳運動”泡沫的膨脹與破滅及中國立場〉，《綠葉》2010 年第 11 期，第 130 頁。

¹⁰ 易鵬：《低碳真相》第 1~3 頁。

本哈根大會是“悲慘的失敗”。¹¹

2009年12月7日，當哥本哈根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召開的時候，只能容納1.5萬人的貝拉中心當天“被迫”接待3.4萬人，其中媒體記者多達五千人，確認參加的國家和國際組織領導人就超過了一百人，這種規模在世界歷史上都是少見的。這一熱鬧非凡的場景如同一團熊熊燃燒的火焰，讓世界民衆心田裡閃耀著一種希望、一種期待、一種夢想。於是，讓筆者想起一句西諺：什麼叫庸人，庸人就是一根直腸，充滿了恐懼與希望。

哥本哈根大會開幕式後的第一場新聞發佈會上出現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一幕：一名斐濟代表在談到因海平面上升而面臨消失危險的太平洋島國時淚灑會場。

發佈會開始後，來自太平洋島國斐濟的女孩們從主席臺的左側進入，在主席臺前舉起了橫幅：一千萬個人需要一個公平的、目標嚴格、具有法律效應的國際協定。

“我有一個希望，15年後我可以有自己的孩子，他們會有一個家，而那個時候我們還會有一個美麗的島嶼。”來自斐濟的女孩拉維塔哽咽地訴說，“我們什麼也沒有做，可是氣候變化對我們的影響卻最大。我們需要一份對窮人和窮國都公平的協議。”“希望你能幫助我。”拉維塔轉向哥本哈根大會主席康妮·赫澤高，康妮把她緊緊地摟在懷裡。¹²

與哥本哈根大會開幕時的柔情似水的煽情相比，“冬天裡的童話”演變成難以言表的矛盾與糾結，憤怒如潮水般洶湧而來，空前高漲，與日俱增。低碳博弈的硝煙更濃，西方國家萬眾一心，衆口一詞，“2009年年底人類在哥本哈根錯過了拯救地球的最後一次機會”，千夫所指，“中國要負主要責任”。2010年12月在墨西哥坎昆的峰會上，清涼溫柔的海風，清澈湛藍的海水，白色細軟的沙灘將把負責任的大

¹¹ 易鵬：《低碳真相》第1~3頁

¹² 易鵬：《低碳真相》第12頁。

國——中國再次逼向懸崖邊緣，“全世界在等待中國態度的轉變”。慎終追遠，深稽博考，凡是和西方不保持一致的，都是罪魁禍首。

巴菲特 2009 年底斥資 263 億美元，收購全美第二大鐵路企業北伯林頓鐵路公司，參與低碳經濟，成為美國新能源策略的馬前卒。

二、二氧化碳導致全球變暖的謊言和騙局

全球變暖已成為最大的環境問題，關於全球變暖的報道到處可見。氣候在變暖，且是人類排放二氧化碳導致的變暖，早已被奉為真理。一個看起來邏輯完美又淺顯易懂的推理被重複強調：人類活動排放大量二氧化碳→二氧化碳濃度持續增加→溫室效應增強→全球氣溫升高→海平面上升，自然災害增加，物種大量地滅絕→沿海經濟發達地區被淹沒，海洋和陸地的生態系統遭受致命破壞→人類滅絕，地球毀滅；為了避免災難，人類必須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為了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須強制進行碳減排和碳交易……

西方的硬道理舉重若輕，以簡馭繁，仿佛一面照妖鏡，照耀出中國發展才是硬道理，追求 GDP 的心浮氣躁，紅塵熱客。對西方的真經甕天蠡海，似是而非，道聽途說，捕風捉影。妄想擢髮昇天迷失了對地球負責的大方向。

但是，似乎很少有人對這個邏輯鏈條提出疑問。全球變暖真的有這麼可怕嗎？真的是排放二氧化碳導致全球變暖嗎？¹³

在戈爾的紀錄片《不可忽視的真相》2006 年上映一年之後，英國的一個電視節目製作人馬丁·德金（Martin Durkin）拍了一部和他唱反調的片子《全球變暖大騙局》，用列舉數據、採訪科學家的方式，試圖說明全球變暖是由於太陽輻射的變動引起的，與人類排放溫室氣體無關，而且歐美“氣候因二氧化碳排放而變暖”的大人物們在此名

¹³ 黃偉夫：〈揭穿二氧化碳導致全球變暖的謊言〉，《博覽群書》2010 年 9 期，第 10 頁。

義下，干擾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在這部片子中，提出了十大質問：

1、大氣運動是個很複雜的過程，太陽、洋流、宇宙射線都會參與其中，怎麼能簡單地都怪罪於二氧化碳呢？

2、二氧化碳只是地球大氣很小的組成部分，而且這麼小部分的氣體增加，有多少是人引起的也很難說。

3、溫度和二氧化碳的相關曲線和人類發展的進程曲線不符，人類工業高速發展發生在1970年代，但是溫度急速增長卻在1940年代。

4、溫度和二氧化碳的相互關係更像是因為氣溫上昇了，二氧化碳總量跟著增加，可否解釋為：因為海洋本身能存儲二氧化碳，如果溫度升高肯定會有二氧化碳從裡面釋放出來？

5、溫室氣體最主要的是水蒸氣。

6、一萬年內就有過兩次大的溫暖期，一次在14世紀，一次在大禹治水時期，這如何解釋？

7、新能源（太陽能、風能）成本高昂而且不穩定，因此造成的損失誰來負責？這影響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

8、現在大量的研究經費用於研究全球變暖的影響和預測，但是有多少經費是給這些反對全球變暖的科學家進行研究的呢？

9、歷史上就曾經有過格陵蘭冰架完全融化的事情，是否有此事？

10、全球變暖的重要證據——“曲棍球棒”氣溫曲線在科學界到底有沒有可信度？¹⁴

人們尖銳的質問，直接針對戈爾和IPCC。

全球變暖真的可怕嗎？某些科學家們聲稱，全球變暖會導致乾旱洪澇等自然災害的增多。他們將幾乎所有的自然災害都歸咎於全球變暖，深入人心。

但事實上呢？8000~4000多年前的全新世溫暖期，是近萬年來最暖時期，全球各地的溫度比現在高2~5攝氏度。那個時期的地球

¹⁴ 易鵬：《低碳真相》第162~163頁。

遠比現在暖濕，人類生存條件奇佳，人類的發展出現飛躍，埃及文明、兩河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和中國黃河文明相繼誕生，人類從此進入文明社會。這段時期也被古氣候學家稱為“人類最適宜氣候期”。

不利於人類生存的時期確實存在。不過那並不是氣候溫暖期，而是氣候寒冷期。在距今 4000~3700 年和距今 3100~2900 年，及 17 世紀附近，有過三次千年尺度的寒冷期，出現了嚴重的低溫冷害、洪澇、乾旱、沙漠化災害，造成印度河文明在 3900 年前突然湮滅、環地中海文明在三千年前衰落等悲劇的出現。¹⁵

IPCC 2007 年報告的主要內容陸續公佈以來，“人類活動導致二氧化碳增濃是全球變暖的主因”婦孺皆知，深入人心。一時間，人人談變暖，個個說減排。“人類活動導致全球氣候變暖”，假作真來真亦假，照樣能編織邏輯完善的成套體系，表面上嚴絲合縫，雞蛋一樣無懈可擊，實際上前提就是假命題。

“偏聽則暗，兼聽則明”，借用“他山之石”挑戰主流視野的科學研究，以供讀者參考。

Zbigniew Jaworowski 發表論文：〈二氧化碳：我們時代最大的科學醜聞〉。¹⁶ 該文編者按稱：儘管在目前情況下我們不一定全盤認同作者的觀點，但他提供了這個看待全球變暖的獨家視角，卻讓人感到非常震撼，也掀開了不少以前可能被某些宣傳所掩蓋了的真相，這篇長達 15 頁的文章中所體現出的科學態度和嚴謹性不容置疑。以下是該文的摘要：

IPCC 2007 年報告的決策概要部分四個基本聲明為：最重要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主要是人類活動的後果，2005 年它的大氣含量為 379ppmv，在過去的 65 萬年中它昇高了 180~300ppmv；自從 1750

¹⁵ 黃偉夫：〈揭穿二氧化碳導致全球變暖的謊言〉，《博覽群書》2010 年 9 期，第 12 頁。

¹⁶ 《新發現》2007 年第 9 期刊發了文章摘要，全文發於《21 科學與技術》。

年開始，人類活動就導致了氣候變暖；最近半個世紀的變暖為過去1300年來的頂峰，並且“很像”是人類溫室氣體濃度改變造成的；人類活動導致的氣候變暖還將持續幾個世紀。如不採取強烈的政治措施來控制二氧化碳排放，各種各樣的災難都有可能發生。

這個報告中所有的措詞都很強，經常出現諸如“很可能”、“極有可能”、“非常可信”、“毫不含糊”。人類活動導致二氧化碳含量升高是該報告的基石，然後據此構建了整個全球變暖的大廈。而事實上這些觀點都是不正確的，該報告稱二氧化碳為最重要的溫室氣體，殊不知更重要的一種溫室氣體卻是水蒸氣，它對於溫室效應的貢獻達到了95%，而該報告卻對此絕口不提。另一個沒被該報告提及的一個基本事實是二氧化碳年度排放中的97%來自大自然中的山脈和海洋，而人類活動充其量只貢獻了3%，而這3%對於整個溫室效應的貢獻只不過是0.12%。把這麼微小的部分放大到會帶來人類能量系統的改變甚至毀滅，而視長期以來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本來就存在較大波動的事實於不見，這是極其不負責任的。

過去幾十年以來，有很多從事冰河學研究的氣候學家，他們致力於從遠古的冰核中挖出兩條“事實”：二氧化碳含量在大氣中升高了；它們是人類活動帶來的。且不說在漫長的地質年代中，冰核能否從頭到尾保持為一個封閉系統，更讓人懷疑的是，在冷水中二氧化碳的溶解度達到氮氣的70倍和氧氣的30倍，那麼誰能確保冰核能真正紀錄下當時的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呢？在1821~1961年間，在亞洲、美洲和歐洲，研究者進行了九萬多次二氧化碳含量的直接測量……這些測量結果在175份技術論文刊物上發表，Ernst-Georg Beck去年對它們進行了系統回顧和分析，這些研究顯示：人類二氧化碳排放比起1880年增加了30倍，而它在大氣中的含量和1940年以前做出的紀錄基本相似。但氣候學家們對此卻可以置若罔聞，並非因為這些結果是錯的（要知道測量者中甚至包括了兩名諾貝爾獎獲得者），唯一的理由是它們對於人為導致氣候變暖的假設並不支持。

這篇論文的作者 Zbigniew Jaworowski 是全世界著名的“人為導致全球變暖論”的懷疑者，他相信二氧化碳並沒有給全球溫度帶來明顯的影響，基於以下兩點理由：氣溫升高早於二氧化碳含量上昇之前；無論是遠古還是近代，氣候溫暖時期的冰核中二氧化碳濃度都不高。反之，他認為：倒是昇高的氣溫可能帶來二氧化碳濃度的增加，因為由此而致腐殖質的增多以及海洋中二氧化碳溶解度的下降。¹⁷

歷史，就怕對比，其魅力也在這裡，從全球氣候變冷到全球氣候變暖，全是西方的饋贈，真假難辨，有如歷史回放，天道輪迴。經都是西方的經，這個大彎兒是怎麼轉過來的，我一直在想，西方的圖謀到底是什麼？

京都會議一年後，“碳科學”柳暗花明，“莫道前途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剛剛畢業的古氣候學博士曼恩（Michael Mann），制出了一條神奇的曲線圖，這條曲線描述的是 1400~1980 年這大約六百年間北半球平均溫度的變化曲線（後長度延長到一千年）。曼恩畫出來的曲線，左邊大部分階段都比較平坦，甚至略有下降，而到了 20 世紀的一百年，也就是曲線的右翼末端卻陡然上昇。前段平直、末端翹起，這條曲線看起來很像一條曲棍球球桿，故名“曲棍球曲線”。與 IPCC 第一次評估報告中的一千年溫度還原圖相比，原有曲線中中世紀溫暖期的鼓起和 15~18 世紀的小冰期凹陷被“削峰填谷”。顯而易見，該曲線重要性在於易於用來“否定”通常人們質疑氣候變暖說的理由——20 世紀這樣幅度的昇溫過程在古代也有過。這樣一來，1998 年是一千年以來最熱的一年，20 世紀是一千年以來最熱的一個世紀的斷言在該曲線的佐證下就變得理直氣壯了，牛氣沖天了，與 20 世紀二氧化碳濃度上昇的曲線擺在一起，相關關係

¹⁷ 鄧英洵：《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躍遷》，大風出版社 2011 年，第 181~183 頁。

乃至因果關係立刻就“顯而易見”了，撥雲見天了。

IPCC 核心成員霍頓爵士和東英吉利大學氣候研究中心獲知這條曲線之後，大喜過望。2001 年，霍頓正式向全世界宣佈“人類活動導致氣候變暖學說”，成了有十分成熟的科學依據。2001 年發佈的第三次評估報告，把“曲棍球曲線”放在題頭（標題為：〈人類活動對氣候的影響〉），獲得了震懾人心的效果。而曼恩則成為報告的科學基礎章節的主筆，在學術上可謂一步登天，一夜成名。圍繞著曼恩，IPCC 的科學核心組織進行了重組，原東英吉利大學氣候研究中心主將瓊斯和布里發立即成為曼恩的追隨者。曲棍球曲線成為 IPCC 的科學根基，IPCC 核心團隊便成為“曲棍球團隊”，由曼恩及其學生、學術界親緣人員和東英吉利大學氣候研究中心原核心一起組成。

人類活動導致全球變暖學說看似已是板上釘釘，鋼鞭證據，無可置疑了。不過，還有一個疑問：這個曲線是怎麼得來的？有系列記載的溫度資料是從 1850 年代開始的，在此之前，並不存在溫度記錄。因此，古氣象溫度（19 世紀中葉之前的溫度）必須通過其他變量（來自樹輪、冰芯、沉積泥塊等等）還原得到，這些變量就稱之為代理變量。各條代理變量都是一條長達數百年乃至近千年的時間序列（數據串）。所謂古氣候溫度還原就是對各條時間數據系列賦予一定權重的加總得到的結果。曼恩的曲棍球曲線就是“加出來”的一個古氣候。這樣的賦予權重加總的方法，之前的骨幹學者並不是沒有想到，但是誰也沒有做出像曼恩這樣漂亮的曲線：前九百年總體平坦，小有波動，波瀾不驚，後一百年陡然向上。

後來，戈爾在《不可忽視的真相》中就拿這條曲線作為貫穿始終的經典：你說中世紀有溫暖期？你看看這裡：一兩個凸起的小痘痘而已嘛。

由此可見，人類活動導致氣候變暖學說的所謂的“科學根基”，是統計學，而不是物理學。這就給後來戲劇化的突變埋下了伏筆。

在曲棍球曲線納入到第三次評估報告讓碳科學似乎大勢已定後不久，政治上也取得了突破。本來，美國和俄羅斯兩個國家對於京都議定書不感冒（美國是因為小布什上臺的原因，具有雄厚科研基礎的俄羅斯則歷來不認同這套理論），2003 年底，碳盟主英國和俄羅斯達成妥協，俄羅斯用批准京都議定書換取英國支持俄羅斯“入世”。2004 年底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這一年也成為碳金融元年。¹⁸

曲棍球曲線被證偽。但是正在國際碳運動歡呼雀躍之時，曲棍球曲線的科學基礎已經悄然開始冰消雪化。

曼恩的科研基礎在於統計學，那麼熟悉統計學的人們都可以來檢視他的研究成果。曼恩用來得到模擬古氣候溫度曲線的方法是一種常用的方法，叫做“主成分分析”（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這個方法並不高深。

2002 年，加拿大人麥金泰爾（Steven McIntyre）經過曲折要到曼恩的數據和分析方法。麥金泰爾退休前是從事礦業地質數據分析的工程師，對於數據統計非常敏感，曼恩這條曲線和維京人殖民格陵蘭的歷史存在潛在衝突，他因此對這條曲線產生了好奇和疑問，遂欲一探究竟。麥金泰爾拿到數據後，按照統計學通用的方法對於這些數據進行了權重加總，讓人震驚的結果出現了：按照正常的“主成分分析”得出的加權曲線和曼恩的完全不符，其結果是一個雜亂無章的類似於噪聲波動的序列，並沒有明確的走勢，更沒有進入 20 世紀突然翹起的形狀。曲棍球曲線根本不存在！

曼恩的根本錯誤：所謂主成分分析在確定權重過程中需要對於樣本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其中的一道關鍵步驟是要減去各條時間序列數據各自的均值，按照常理，應該減去各自序列總長度的均值（大部分長達數百年，如六百年），但是曼恩的處理步驟，是只減去了從

¹⁸ 簡練：〈“碳運動”泡沫的膨脹與破滅及中國立場〉，《綠葉》2010 年 11 期，第 123~124 頁。

1902 年開始的近一百年部分的（1902~1980 年）數據的均值。正是這樣一個錯誤，使得少數幾條前平後翹的樣本被賦予了極高的權重，這樣一來，自然加總得到的就是一條前平後翹的曲棍球曲線。而這些前平後翹的樣本來源非常狹窄，都來自北美西北部一處地方的狐尾松年輪。換句話說，一個山坡上的幾棵松樹代表了全世界，換句話說，一顆精子，能讓全世界的母體受孕，而其他研究樣本統統不作數。

發現了這些錯誤之後，2003 年麥金泰爾與另一位作者麥基特里克發表了一篇論文。2005 年，針對曼恩的回應，兩麥再次發表了一篇論文，在這篇論文中，麥金泰爾做了模擬實驗，證明曼恩“大變曲棍球”的戲法對於任意（隨機）數據都是有效的。反過來，說明這樣的曲棍球“研究成果”是主題先行的結論！

曲棍球戲法，是氣候學界的地溝油，是三聚氰胺奶粉，造假絕不是中國的專利。兩麥的分析結論為人類進行了一場日光浴。

曼恩等人對此百般阻撓和壓制。不過這件事情不久之後還是引起了美國的關注。2006 年，美國國會能源與商業委員會對這場“曼恩 — 麥金泰爾”的科研論戰進行調查。一方面國會組織了由“主成分分析”統計方法的國內學術領軍人物魏格曼（Wegman）帶頭的調查小組，一方面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其中一些人物與 IPCC 關係很好）也組織了一個氣候模型的重要參與者諾斯帶頭的調查組，雙方在國會山進行了一場交鋒。魏格曼教授明確表示曼恩的處理是錯誤的，不能作為科學基礎。而諾斯則閃爍其詞，說“曼恩的方法‘有問題’，‘但不影響氣候重建的成果’”，他的咋呼，一句話，兩麥是鹹吃蘿蔔淡操心。到底有問題還是沒有問題？不做表態，拖延時間。讓主流媒體不關注或不明白這次質詢，才是諾斯率團攪局的真實目的。¹⁹

¹⁹ 相關論戰，可參考《“曲棍球”幻像》（*Hockey Stick Illusion*）。中文著作方面，可參考黃為鵬：〈“曲棍球桿曲線”醜聞、氣候泡沫與氣候政治的未來〉，北京大學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報告》總第 38 期。

一時間，質疑並沒有引起全球關注。曲棍球曲線仍舊惑亂人心。

曲棍球團隊和 IPCC 則抓緊進行宣傳造勢，為 2009 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會議鼓噪而進，以求犁庭掃閭。期間，戈爾的《不可忽視的真相》、IPCC 第四次評估報告紛紛出爐，戈爾和 IPCC 還同獲 2007 年諾貝爾和平獎，仿佛勝券在握。《真相》和第四次評估報告紛紛採用加重的不容置疑的語氣，以“喜馬拉雅冰川即將在 2035 年絕大部分融化”、電腦製作出來的北極熊溺死在海洋等聳動語言和形象，全力推銷：“人類活動導致全球變暖，拯救地球，時間只剩下幾年時間”！

2009 年氣候門事件。2009 年 11 月 17 日，在哥本哈根會議召開 20 天前，對於 IPCC 核心科學骨幹“曲棍球團隊”的致命打擊以一種出人意料的方式到來了，這就是“氣候門”事件。IPCC 科學團隊的大本營——英國東英吉利大學氣候研究中心和曼恩等人的往來郵件被曝光，曼恩與其曲棍球團隊如何刻意製造、完善及如何對麥金泰爾的聲音進行打壓的內幕完全泄漏。氣候門龍捲風席捲歐美。當事人陷入惶恐，東英吉利大學氣候研究中心主任瓊斯坦言：那天晚上我真想自殺了結！為什麼氣候門那麼重要？因為氣候門打破了原來“麥金泰爾衝擊波”在小範圍較量的格局，直接以大眾能看懂的方式把這個關鍵爭議公之天下，言之鑿鑿。造假者豈不前功盡棄，毀於一旦？

在這種情況下，碳運動集團處理的主要方針仍然是轉移視線，大事化小，小步後退，等到事情有些淡化的時候再捲土重來，和對付麥金泰爾衝擊波如出一轍。不過不管如何，碳運動的科學支柱已經坍塌了。碳運動的光環已經褪去了。²⁰

黃偉夫的研究十分專業：地球物理所的專家論證，近一萬年來的四次暖期（兩大兩小），溫度分別比現在高 1~5 攝氏度，甚至比 IPCC 等所渲染的導致全球大災難的溫度警戒線也高得多，但海平面最高的

²⁰ 簡練：〈“碳運動”泡沫的膨脹與破滅及中國〉，《綠葉》2010 年 11 期，第 125~126 頁。

時期也只比現在高 2~3 米。全球變暖帶來的海平面上升問題，遠沒有 IPCC 渲染的那樣嚴重，人類完全有能力應對，荷蘭的存在，就是有力的證明。

IPCC 聲稱，如果全球溫度與 1980~1999 年相比上昇 1.5~2.5 攝氏度，全球 20~30% 的物種將面臨滅絕風險，如果上昇 3.5 度，則會導致 40~70% 的物種滅絕。實際上，現代幾乎所有的物種在地球上至少存在了一百萬年的歷史。在這一百萬年裡的暖期，全球氣溫要遠高於 IPCC 所預言的閾值溫度，卻沒有哪個物種因此滅絕。它們在之前更高的溫度暖化中沒有滅絕，怎麼會在這次的“暖化”中滅絕呢？現在造成物種滅絕的主要原因是人類的捕殺、對棲息地的破壞和環境污染、大面積種植單一品種作物，而與氣溫變化無關。

人類本來就是動物，但人類又是其它動物的天敵。人類真正的原罪是來源於動物又比一般動物更兇猛。動物只能適應環境，慾望有限，而人類確有無限的慾望，創造了透支環境。透支環境就是透支未來，科學技術與環境的承受能力賽跑。劉源說，“某大屠宰場‘人道先兵’，豬牛羊先‘執行電刑’‘安樂死’，再過刀‘放血’。如此非暴力，總給人虛頭巴腦的感覺。”這不，如此講“畜道”的地方，卻大量使用能致人性命的“瘦肉精”。這才是人類的真問題。

再說冰川門。法國的衛星觀測表明，南極地區每年降水超過 1.81 釐米，這意味著南極大陸每年的冰雪不僅沒有減少，而且還增加了 450 億噸。從南極中山、長城站的觀測數據看，目前南極西部地區的冰雪在融化，而東部地區的冰雪在增加。

再說冰川融化。普通民衆誤以為沒有人類的影響，冰川面積是不會發生變化的。即使 IPCC 的“冰川門”醜聞曝光，但“人類活動造成冰川融化”的觀點依然站在真理的制高點上。竺可楨在 1973 年發表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所引用的“一萬年來挪威雪線高度變化圖”說明，僅僅是這一萬年來，雪線高度的變化就非

常大，也就是說冰川面積的變化非常大。按照自然變化規律，雪線高度存在向上變化的趨勢，冰川面積將繼續減小，這與人類排放二氧化碳無關。同時，這種變化波動在正常變化範圍之內，屬正常變化。

氣候變暖是好事，氣候變冷才是壞事。一萬年來，地球經歷了四次暖期和四次冷期。所謂的“極端天氣”、“氣候災難”，在冷期出現的頻率遠遠大於暖期。現在民衆感覺“極端天氣”增多，更多是因為在信息時代，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手機短信用戶和計算機網絡用戶動輒幾億，幾何級數增長。日本福島核事故，從沿海城市到拉薩，同一天搶購食鹽，謠言比風都快。無怪乎，我家的保姆都能講出2012年地球要毀滅，而且言之鑿鑿，有根有據。這是信息垃圾相關的傳播頻率被有意或無意增加的緣故。²¹

太陽的輻射是短波輻射，大氣的吸收很弱。地表在吸收了直接來自太陽的短波輻射後，能以長波輻射形式，把這種太陽能量重新釋放出來。溫室氣體指的就是大氣中能與長波輻射產生共振，使其本身的分子溫度上昇從而使大氣保持溫暖的氣體。這種溫室氣體使地球變得更溫暖，因而被稱為“溫室效應”（準確的說法是“大氣保溫效應”或“大氣效應”）。

地球大氣中主要的溫室氣體包括以下幾種：水汽、臭氧、二氧化碳、氧化亞氮、甲烷、氫氟氯碳化物類（CFCs，HFCs，HCFCs）、全氟碳化物（PFCs）及六氟化硫（SF₆）等。

二氧化碳的分子結構決定只能和15微米帶、十微米帶、5.2微米帶等波段的長波輻射產生共振。而水汽的共振區間幾乎覆蓋了所有波段。除了15微米的二氧化碳共振能力最主要的波段外，幾乎在四微米以上的所有波段，水汽的共振能力，即長波輻射吸收能力，都遠遠大於二氧化碳。也就是說，在同等濃度下，水汽的溫室效應遠遠強

²¹ 黃偉夫：〈揭穿二氧化碳導致全球變暖的謊言〉，《博覽群書》2010年第9期，第11~12頁。

於二氧化碳。

那麼，二氧化碳和水汽在大氣中的濃度又分別是多少呢？

二氧化碳在大氣中體積濃度是 385ppm（1ppm 表示體積濃度為百萬分之一），不到大氣的萬分之四。大氣中的水汽濃度則平均高達 10000ppm（1%），其在近地面大氣層中佔 4% 以上。也就是說，水汽在空氣中的濃度平均是二氧化碳的 26 倍，在近地面層大氣中更是二氧化碳的一百倍以上。

通過比較二氧化碳和水汽的長波輻射吸收能力與濃度，可得到一個結論——二氧化碳在“溫室效應”中的作用非常小。

此外，二氧化碳的溫室效應已經基本飽和。二氧化碳吸收能力最強的波段為 15 微米光帶中心波段，這個波段吸收的地球輻射佔二氧化碳全部吸收強度的 90% 左右，而二氧化碳這個波段吸收地面輻射的能力早已飽和，即使二氧化碳在大氣中的濃度增加八倍也不會增強。5.2 微米光帶和十微米光帶雖未飽和，但吸收能力極弱，可以忽略不計。只有 15 微米光帶兩翼沒有飽和且有較大的吸收能力，但是即使在這個波段，吸收能力也遠低於水汽。²²

二氧化碳在“溫室效應”中的作用非常小，並且其溫室效應也已經基本飽和。很明顯，二氧化碳在氣候變化中作用非常有限，其濃度增加對氣候的影響非常微小，完全應該忽略不計。即使我們現在不排放任何二氧化碳，和大量排放二氧化碳一樣，氣候變化水汽、二氧化碳、氧氣和臭氧、一氧化二氮以及甲烷的吸收光譜（盛裴軒等，2003）都不會有明顯的改變。現在的氣候變暖是自然因素引起的正常變化。

1860~2000 年以來全球氣溫的變化（引自 IPCC 第四次評估報告，2007 年）數據來自各地的溫度計，沒有考慮城市中的溫度計受城市熱島效應而產生的誤差。假如消除因城市熱島效應造成的誤差，則

²² 參見劉玉芝、肖穩安、石廣玉：〈論大氣二氧化碳溫室效應的飽和度〉，《地球科學進展》，2002 年 10 月第 17 卷第 5 期，第 653~657 頁。

所有的數據都應下調，並且越往後下調幅度越大。

自工業革命以來，二氧化碳在大氣中的比例逐年升高。如果二氧化碳濃度升高真的會增強溫室效應的話，那麼在這二百多年裡，全球氣溫應該持續上昇，並隨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多，昇溫幅度應該越來越大。但實際卻相反，從 1860~2000 年全球氣溫變化曲線圖看，在 1940 年之前全球氣溫上昇明顯，但那時的二氧化碳排放卻很低。另一方面，從 1935 年到 1975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急劇增加，而全球氣溫卻出現持續 40 年的下降。1968 年冬，冰島與格陵蘭島居然被冰蓋連接起來，以至於與現在相反的全球變冷觀點，成為那個時期的主流觀點。1974 年《時代》雜誌甚至預測另一個“冰川期”將到來。

與全球變暖理論驚人地相同，當時的一些科學家認為，是發展中國家的工業發展排放了大量的煙霧，造成部分太陽光無法進入地表，所以，為了“拯救全人類”，應該限制發展中國家的工業。

竺可楨在 1973 年發表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中，駁斥了當時盛行的“全球變冷”觀點。研究證明，目前正處在 17 世紀小冰期盛期已過的增暖期，全球氣溫存在變暖的趨勢，其將會在波動中上昇，這個上昇的趨勢早在 1700 年就已開始了，它比工業革命還早了一百多年。竺可楨明確指出“地球上氣候大的變動是受太陽輻射所控制，氣候上小的變動，如年溫 1~2 攝氏度的變動，則受大氣環流所左右”。這個事實反駁了人類排放二氧化碳導致了全球變暖的謬論。²³

中國氣象科學院研究員任振球認為：人為溫室效應和自然因素兩者都很重要，不可偏廢。這裡所說的自然因素主要是天文因子的影響：一是太陽活動在近百年的總趨勢在增強，尤其是 1980 年代以來已實測到太陽活動在增強。隨此，近 20 年來火星表面溫度上昇了 0.65

²³ 黃偉夫：〈揭穿二氧化碳導致全球變暖的謊言〉，《博覽群書》2010 年第 9 期，第 12~13 頁。

攝氏度，火星南極的冰帽也在逐漸融化。二是根據他的研究，準週期為 1000~1400 年尺度的氣候變遷，主要是由八大行星的地心會聚且地心張角小於 / 等於 47 度的力矩效應所引起；而當前正處在此種千年尺度週期變化的溫暖階段（17 世紀小冰期已過去四百年）。因此，上述兩種天文背景對地球氣候的影響必須考慮。

任振球認為：與許多主流學者的看法相反，歷史氣候變遷的事實至少在千年和百年尺度上的氣候變暖期，往往是全球嚴重自然災害相對較輕、較少的時期；而氣候變冷期，才是各種嚴重自然災害的群發期。例如六千年前的溫暖期，當時的全球溫度比現今約高 2.5~3 攝氏度，與溫室效應數值模擬的結論到 21 世紀末的全球溫度大體相當；而六千年前青藏高原的降水相當豐富，那時它的湖泊水面高度比現今分別高 8~60 米，塔里木和羅布泊的水量都很大。可見，高原冰川因氣候增暖而消融，並不等於多年降水總量的減少。在六千年前的全新世溫暖期，現今的非洲撒哈拉大沙漠當時為大草原，塔克拉瑪幹大沙漠也大為縮小。²⁴

多四季學說的啟示。多四季學說的提出者董妙先認為：天文地質化石等各方面的大量證據表明，地球上曾經經歷過不同週期的四季變化，有一年及數年的小四季，也有五百年、兩千年、上萬年的四季，還有長達五百萬年、2600 萬年、2.3 億年（太陽繞銀心運動的週期）等各種不同週期的大四季。由於整個太陽系在繞行中相當靠近某個恆星體系，如天文學家赫謝爾證實太陽系大約以每秒 20 公里的速度穿越太空向武仙星座方向運動，因而整個地球在一定的時期內變得越來越溫暖。據科學的統計，近代地球的平均溫度按每百年 1.1 攝氏度的速率在上昇。地球物理所進行的觀測表明：幾乎所有各處的冰川確實都在退縮。據 1959 年的報告，喜馬拉雅山的最大冰川之一從 1935

²⁴ 任振球：〈當代氣候變暖有待商榷的幾個問題〉，《綠葉》2007 年第 8 期。

年已經後退了 210 米，有一些冰川已經後退了三百米，甚至還有退縮六百米的。海平面每年都在升高，而這正是冰川融化所必然帶來的一個後果。這些決不是“溫室效應”所能左右的。²⁵

按與太陽熱源的遠近，我們的地球相應的正處於大春季。地質資料表明，地中海自成海以來，至少乾枯過 15 次。在 1954~1957 年間，中國學者在西安半坡村遺址的發掘中，發現了距今五千多年前生活在那裡的貉、水獐等動物的骨骼，在甘肅還挖掘出完整的象化石——黃河古象。河南古稱豫州，與大象有關，可見今日生活在南方熱帶森林的象群，昔日在黃河流域繁衍，說明五千多年前，地球氣溫是何等的高！20 世紀初，全球開始進入新的五百年的小春季（每個兩千年的中四季又包含了一個小四季，每季約五百年）。公元 1400~1900 公元年這五百年間是世界寒冷的時期，稱之為“小冰河期”。人類進入 20 世紀以來，表明上次小冰河期已過去，我們進入了新的五百年的春季。氣溫總的趨勢在升高，這其中雖然包含了溫室效應的因素，但起主導作用的是地球在天體運行中的位置關係。因為人類在遠古時代的氣溫比現在還要高得多。²⁶

日美歐科學家最近對南極冰芯進行的分析顯示，北半球高緯度地區夏季日照時增加，是促使地球的冰期與間冰期轉換的關鍵原因。這一結果為解釋上述轉換的著名“米氏學說”提供了新的證據。前南斯拉夫學者米蘭科維奇在 80 多年前提出了“米氏學說”：由於地球公轉軌道偏心率等因素的變化，導致北半球中高緯度地區夏季日照量出現週期性變化，這是造成地球的冰期和間冰期相互轉換的根本原因。

²⁵ 董妙先：《多四季論》，武漢測繪科技大學出版社 1991 年。多四季學說的內容是：地球在橢圓軌道上圍繞太陽公轉，形成週期為一年的四季。在它參與太陽系，圍繞太陽和其近星系的質心公轉，乃至圍繞銀河系的銀心及更大星系公轉時，由於不同強度的熱源距離、輻射角的變化而形成不同週期、不同程度的四季變化。

²⁶ 董妙先：《多四季論》。

日本極地研究所等機構的科學家報告說，他們對南極冰芯進行分析後確認，北半球日照量的變化可以引發包括南半球在內的全球尺度的氣候變化。對比結果表明：過去幾十萬年中地球上共發生過四次冰期向間冰期的轉變，全部由北半球高緯度地區夏季日照量增大所引起。²⁷

綜上所述，根據地球上生物和人類的歷史來看，他們曾經經過多次冷暖交替的週期變化；幾十萬年以來，全球溫度的趨勢性變化的主要動因仍是自主自律的，它主要服從於米蘭科維奇週期，²⁸ 此其一。

其二，在今後數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氣候增溫階段，減少人類排碳，不可能從根本上扭轉全球氣溫的趨勢性上升，但按照《京都議定書》的框架進行減排仍有必要，可以改善城市地區空氣質量和天氣環境。

《京都議定書》，雙刃劍，一個硬幣的兩面，要把握的是度。中國主動減排，轉變發展方式，發展還是硬道理。不許中國發展，要發展就要向西方交碳稅，買碳指標，這裡有霸道。帝國主義決不是陳年往事，我們是反帝不臉紅。我們中國人很難理解，金融海嘯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英法成百億地消減軍費，窮得都快當褲子的法國卻在海外專找小國弱國，同時打三場戰爭。薩科奇在他衆多紅顏知己面前，特男子漢。他自詡“國際”，嫌你搗亂，你若心悅誠服，全面接受，甘做附庸，上交供賦，他給你一席之地，分你一杯羹，這是西方基本文化立場和霸道。

其三，氣候變暖並不全是消極的作用。在遙遠的地質暖期，恰恰是物種極為豐富的時期；寒武紀生命大爆發就得益於氣候變暖；而在氣候非常溫暖濕潤的二疊紀，我國北方擁有大量的森林，成為石油、

²⁷ 《科技日報》2007年8月25日。

²⁸ 地球公轉軌道變化的週期（約41萬年和十萬年的週期），地球自轉軸傾角變化的週期（約4.1萬年的週期），地球運動（幾差）的週期（約2.3萬年和1.9萬年的週期）；太陽輻射量的變化是上述效應的綜合結果——即米蘭科維奇週期（《牛頓科學世界》2007年第10期）。

煤炭得以富積的重要時期；六千萬年前，地球大氣中的二氧化碳 4~10 倍於今天的含量，但它並沒有毀滅地球，生物反而向更高級的形式進步了；到了 11~12 萬年前的溫暖時代，歐亞大陸人類正從舊石器時代步入新石器時代，那時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與現在相當。3~4 萬年前，又是一個溫暖時期，在全球範圍內人類同樣迎來黃金擴張期，北美、澳洲及我國青藏高原的人類都是那時遷徙過去的。6000~3500 年前的全新世大暖期（我國大禹治水的年代），地球年均溫度比現在高 2~4 攝氏度，全球普遍溫暖，歐洲大陸酷夏頻頻，而中國則持續暖冬；於是植物生長期延長，冰點天氣縮短，落葉林北移，這讓人類的食物更加豐富，活動範圍更廣闊，促成了中華文化的大發展和民族的大繁榮。

其四，氣候變暖對人類最大的不利作用是海面上升。IPCC 曾經預測，21 世紀海平面上升的最大值為 0.81 米，但英國國家海洋學中心的研究人員在《自然·地球科學》雜誌上報告說，21 世紀海平面將會上升 1.63 米。海平面上升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海洋變暖導致海水膨脹；二是陸地冰層融化，海平面上升是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主要影響之一。變暖既然不是人類的行為可以左右，人類只能敬畏自然，適應大自然的無窮法力，荷蘭國土有相當部分在海平面之下，還不是世界上少數發達國家，生聚教訓，早籌良策，豈有它哉！

二氧化碳的增加造成全球變暖，這幾乎已經成為一個定論。2004 年上映的電影《後天》中的景象，所依據的理論就是人類活動導致地球變暖，從而引起冰雪災害等極端天氣頻發，溫室效應導致兩極冰蓋消融，水溫和鹽分的改變引發了洋流和氣流循環的變化，最終使中高緯度地區進入了新的冰川時代。電影中美國被全部冰凍，政府不得不帶領民衆退往仍然溫暖的墨西哥。人們經常拿現實中的極端天氣與電影中的情節作類比，提出正是由於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讓全球變暖，才導致了這些極端天氣的出現。

錢維宏教授認為電影《後天》中的科學觀點值得商榷，甚至有荒謬之處，因為全球大氣中二氧化碳增多，應該會導致全球溫度一起升高，不可能有些地方升高，有些地方降低。錢教授太和西方電影較真兒了，西方電影有尋常看不見，深鎖煙霧中的意識形態，話語霸權，通過高投入，大製作的票房價值實現。這不，電影《2012》對全球氣候變暖忽悠得更邪乎，但幾乎人見人愛，美輪美奐，全世界都為其大掏腰包。

低碳為什麼這麼熱？中國的許多學者認識到，低碳熱是被氣候現象、科學理論、媒體“嚇”出來的，被環保主義運動“喊”出來的，也是被國際博弈產生的國際法“框”出來的，更是被低碳經濟的大蛋糕“誘”出來的。這都對，但最根本的，“低碳”、“全球氣候變暖”是另一種“普世價值觀”和“西方中心論”。帝國主義的嗜血本性一也沒有變。接軌不能目中無人，更不能只有西方人，沒有東方人，不能輕言犧牲，哪怕是為了長遠得益。我們不能說，為了國際就該犧牲中國，為了發達國家就該犧牲發展中國家，為了美國鍋裡的就該犧牲中國碗裡的，為了爭能源，就把中國開除球籍。

三、另一種“普世價值觀”和“西方中心論”

可見，所謂“人類排放二氧化碳導致溫室效應加劇從而造成全球災難性地變暖”理論純屬無稽之談。那麼許多人大肆宣揚這種謬論的居心安在？且讓我們從他們所設計的碳交易講起。

在西方，“碳泡沫”除了“碳科學”外，由“碳道德”、“碳社運/碳政治”和“碳金融”三者構成。“碳社運”鼓吹“碳道德”，“碳道德”支持“碳金融”，“碳金融”反哺“碳運動”。這碳道德和碳運動的主推實體在西方定義為“左派”，而碳金融的主力屬於“金融右派”，看似是政治光譜兩極，卻暗藏相通之處，兩者極具互

補性。就如中國“弘揚傳統”，提倡儒教者，不少是“左派”，但他們對西方饋贈的“強國夢”暗渡陳倉。普世價值和儒教的和合學，相互之間也是暗送秋波，勢合形離。

“碳道德”、“碳運動”的奠基者文化左派，其最大特點是對於人類文明持一種“有罪”的心理，希望用一種倒退回田園生活的方式去贖罪，這是一種“痛並快樂著”的心態。但是這種極端的態度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實現。於是這些組織紛紛退而求其次，大搞“不以善小而不為，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狠鬥私字一閃念，這就能拯救地球”等社會運動來尋求慰藉，可是這些 NGO 發明出來的小事要麼效果有限，徒增浪費，要麼是會造成嚴重後果的——“全球熄燈一小時”運動就是典型的具有破壞性（加大電力負載的瞬間波動產生振蕩，可能造成嚴重後果）的案例。這批組織最大的特點是特別喜歡拉演員，特別是女性演員進行公關宣傳，以“感染社會”，最後無一例外走向行為藝術：要麼是上層的公關姿態秀，走走場子（如布萊爾的“氣候組織”在中國和某些演員男女之間的合作），要麼是下層草根激烈的衝撞社會，宣泄情感（如綠色和平在英美的舉動），從來不思考自己行動的社會後果是什麼。

中國已經第三次參加這項走秀活動，也是請大美女李冰冰擔任形象大使。款腕星與官產學媒能搞出什麼低碳生活？這不都是鬼蜮伎倆包藏禍心。深文周納神龍見首不見尾的目的都是要窮國為富國買單。

文化左派與金融右派本是歡喜冤家，但弔詭的是，雙方在碳運動方面走到了一起，合力吹起了空前絕後的碳泡沫。

本質是什麼？世界上沒有任何主義、制度、機制，能夠有效地遏制美國向全球轉嫁金融危機代價；對於西方的全球化，中國除了盡力“融入”，現在也沒有“去依附”的能力；對於西方的話語霸權，中國也無法建立自己完整的話語體系，現實就是這樣，但不能因為自己的能力有限，該反對的也不反對，該批判的也不批判。

四處尋覓和開發投機領域是金融資本的天性。嗅覺靈敏的金融資本，很快就從碳運動那裡發現了發財的機會。早在里約會議時，相關的碳排放權作為商品及其衍生品（期貨、期權）的開發就已經由芝加哥期貨交易所中利率期貨合約的發明者桑德爾（Richard Sandor）構想出來了。在英國政府、戈爾和 IPCC 各股勢力的大力推動下，京都會議於 1997 年召開。《京都議定書》中設定了三種減排機制，其中兩種都涉及排放額交易：發達國家之間合作減排的 JI（Joint Implementation）和發展中國家減排後創造碳匯經中介收購再提供給發達國家的 CDM（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這就是碳金融的法律依據。不過，由於京都議定書的國際法律效力生效前，碳金融並不為資本市場所重視，除了一個倒霉的實體——安然公司之外，早期的碳金融少有私人實體問津，只有世界銀行和部分發達國家如歐洲國家的政府組織的碳基金進行少量 CDM 項目的碳匯收購。

2004 年底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各類“氣候變化”的老牌 NGO 歡聲雷動，而私人碳金融則按捺不住，開始狂奔。各大碳基金紛紛在金融管制鬆散的離岸地（如倫敦）成立。2004 年是英國和歐洲的碳基金和與碳基金直接相關的 NGO 成立的“爆發年”，布萊爾的馬甲 NGO “氣候組織”就是這一時機誕生的。很快，碳基金的目標就對準了中國，第一步是在中國搞 CDM 項目，讓中國部分企業作為碳匯的創造者，得小利，碳基金收購倒賣，得大利，而更大的未來利益則在於讓中國成為碳匯的購買者。同時，美國的桑德爾則成立了芝加哥氣候交易所，又成立了歐洲氣候交易所。他的思路就是建立一個一統江湖的交易平臺，讓碳金融告別零敲碎打的櫃檯交易狀態——試想未來全球 24 小時一邊排放二氧化碳一邊要進行碳交易，他這個交易所抽取佣金還不是抽到手軟？

在同一時期，另一隻力量開始大規模加入“碳運動”，這就是西方投行等華爾街機構。本來，這類機構沒有太關注氣候變化，至多將

其作為“企業社會責任”之類的公關活動做點姿態，例如匯豐銀行提出的銀行運作“碳中和”概念。這原因主要是京都議定書在國際上並未生效，同時美國房地產帶動的次貸等業務還蒸蒸日上，看不上“碳交易”。事情到 2006 年開始起變化，一方面，歐洲帶頭的碳交易已經隨著京都議定書生效開始“試運轉”了，另一方面，次貸這碗飯也有點餿了。恰逢其時，碳運動盟主英國政府通過財政部，讓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史騰爵士 (Nicholas Stern) 撰寫〈氣候變化經濟學報告〉，史稱〈史騰報告〉。這篇報告引起了華爾街的重視。2007 年 2 月和 9 月，在與史騰爵士進行充分交流後，雷曼兄弟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盧愛林發表〈氣候變化的生意〉 (The Business of Climate Change) 和〈氣候變化的生意 II〉 (The Business of Climate Change II)。同年雷曼成立“氣候變化委員會” (Council on Climate Change)，CEO 富爾德在年報裡大談這兩份大報告，顯然轉向已成大勢。倒霉的是，全球金融危機突如其來，很快雷曼關門大吉，而碳金融交易隨著大買家歐洲經濟萎縮而行情向下，遭遇挫折。不過這不妨礙雷曼有它精神上的繼承者——德意志銀行，後者變成碳運動在金融界的先鋒戰士。德意志銀行又設戶外碳鐘又設網絡碳鐘，代表華爾街全力向哥本哈根衝刺。氣候門事件發生後，德意志銀行則與“前休克療法專家現氣候變化活躍分子”薩克斯——因在蘇聯推行休克療法失敗而聲名狼藉——領導的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的地球研究中心 (Earth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簽署“戰略性合作協議”，一週後就寫了一份〈氣候變化——談談主要“懷疑論者”的論據〉進行補救。

國人對碳金融的險惡認識尚淺，即以頭罩環保光環的 CDM 機制為例來說明。不可否認的是，未來中國將會長期是全球第一碳排放國。那麼，西方大力推銷 CDM 機制，意圖就是先拉中國進入強制減排的國家，而很快中國將不是 CDM 的碳匯創造國，而是碳匯淨購買國，這時中國將成為世界最大冤大頭。因此，當前 CDM 的天上餡餅

不過是引誘的小利，如被小利所迷惑，最後付出的代價將不知會多少倍於今日之短期收穫。²⁹ 簡練的分析十分到位：

IPCC 為代表，遏制“全球變暖”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開出的藥方是“碳交易”。簡而言之，碳交易就是碳排放額超出國際會議分配配額的國家或地區向碳排放額沒有超出配額的國家或地區購買碳排放額。

或許有人說，現在發展中國家的減排指標小，現在是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買碳稅，並且發達國家率先減排，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都有好處的。——但是那只是表象，後面是陷阱。

IPCC 在哥本哈根規定了一個 450ppm 的大氣二氧化碳的濃度控制目標。按照這個濃度目標，全世界到 2050 年只能排放八千億噸二氧化碳。在這個總量中，發達國家確定“率先減排”的比例而對發展中國家沒有做具體的規定，似乎他們很“負責”、很“公平”、很“仗義”。八千億噸二氧化碳的總排放額，扣除了發達國家自己規定的碳排放額，餘下的就是發展中國家的排放權。以 IPCC 方案為例，佔全球人口不到 15% 的發達國家自己確定的碳排放額為他們搶先佔了總份額 40% 以上，而給佔全球人口 85% 的發展中國家留下的只有 50% 多。發達國家被實質上規定擁有發展中國家 2~3 倍的人均碳排放權。而發展中國家對這樣的一個陷阱似乎還沒有充分的認識，只是強調發達國家到 2020 年，只比 1990 年減排 25% 是不夠的，應該減排 40%。接受發達國家自己提出按照現在各國實際的排放量進行減排的計劃減排，發展中國家就進入了陷阱，發展中國家的未來就被規定必須接受發達國家剝削。並且，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剝削還是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

發達國家已完成了工業化，並已把高能耗高排放的工業都轉移到了發展中國家，佔全球總人口 15% 的 27 個發達國家 1900~2005 年期

²⁹ 簡練：〈“碳運動”泡沫的膨脹與破滅及中國〉，《綠葉》2010 年第 11 期，第 127~130 頁。

間的人均累計排放為 251.17 噸碳，而發展中國家僅為 33.33 噸碳，相差 7.54 倍。這 27 個國家在 1900~2005 年期間排放了全球 60% 以上的二氧化碳。

而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剛剛進入將要大規模排放二氧化碳的工業化時期。發達國家早已完成工業化和現代化，基礎設施早已完善，現在的碳排放以消費為主；而發展中國家的公路、鐵路、基建等基礎設施極其落後，現在的碳排放以投資為主。一個是生產“波音”、“空客”都要賠錢，從出生到墳墓都要用中國的尿不濕到中國出口的大理石石碑的高福利國家，在科學精神、法律精神、道德精神都站在制高點的後工業化發達國家；一個是勞動密集、資源密集、污染密集的世界工廠。前者科學的、道德的向後者收碳稅，“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後者只能捨己從人，時乖命蹇。

以中國為例。IPCC 分配給中國的碳排放額只夠中國使用到 2020 年左右，此後中國每年需要花費一萬億人民幣來購買二氧化碳排放權，人均需向發達國家繳納七百元左右。預計到 2030 年以後中國每年將花費一萬億美元以上購買碳排放權，人均需繳納五千元！

西方人可不是小商小販，工廠裡精工細作，市場上精打細算。蠅頭微利，銖緡必計，漫天要價，就地還錢。西方的“低碳金融”是摘蘋果的時候，他們要摘的蘋果個最大，是整個地球上的新興經濟體！

發達國家不但不會償還他們歷史上過度享受而對全人類造成的環境威脅舊賬，而且還理所當然地繼續享受這種待遇，並規定發展中國家不得發展，發展中國家的人們不得享受發達國家人們的生活（或者花鉅資購買所謂的“碳排放額”之後再發展）。

更可怕的是，現在美國歐盟已經開始著手對進口產品徵收“碳關稅”了。根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如果碳關稅全面實施，在國際市場上，“中國製造”可能將面臨平均 26% 的關稅，出口量因此可能下滑 21%。這一專門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稅種，將起到兩大作用：第一，

遏制發展中國家發展，強力打壓發展中國家企業的競爭力；第二，發達國家不需耗費一槍一彈，不需承擔任何道義上的責任，並且還是在包括發展中國家人民在內的全世界人民的一片叫好聲中攫取了發展中國家大量的財富。

揭露碳減排陰謀並非是反對節能環保，恰恰相反，只有揭露了碳減排陰謀，才能更好地做節能環保事業。我們的世界存在著大量環境的問題，垃圾圍城、化學污染、資源消耗殆盡、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尤其是水、空氣、食品污染）、水土流失、荒漠化等等，它們無處不在。但是，當我們都去為了“二氧化碳引發全球變暖導致地球毀滅”這樣的一個偽命題而忽略了真問題的時候，“氣候危機”所掩蓋了的真正的問題和危機卻會正因為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而不斷惡化。³⁰

膿瘡潰爛，不是膿瘡出了問題，而是身體出了問題。首先是西方身體出了問題，上百年的霧都倫敦，萊茵河幾十年無魚，現在卻否極泰來，污染都轉嫁給誰了？

如同理論界常常提到的與國際慣例接軌，應該是不光與少數人發財的國際慣例接軌，而應該與食品安全、藥品安全、勞動安全、事故賠償、貧困標準、失業保障、醫療保險、最低工資等涉及多數勞動者福祉的國際慣例接軌，應當成為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努力方向。

世界金融海嘯，主權債務危機，中國如果不按西方規則出牌，借機推翻新三座大山（教育、醫療、社保）：勞動力成本普遍上昇，出口就會減少；大多數人增加收入，擴大內需，出口轉內銷，勞動密集型產品，勞動人民多消費；人民幣減緩升值，投機熱錢減少，廉價出口減少，貿易戰減少。多好的事兒，但西方國家不答應，中國的中等收入者也會不答應，不少中等收入者連保姆也僱不起了。西方中產階級有幾家能僱得起保姆？

³⁰ 黃偉夫：〈揭穿二氧化碳導致全球變暖的謊言〉，《博覽群書》2010年第9期，第13~15頁。

四、我們的方針是：節能減排降耗治污調水的漸進改革

環境友好，資源節約與低碳運動，抑制全球氣候變暖的風聲水起風馬牛不相及。節能減排降耗治污也搞不得急風暴雨式的華麗轉身。迄今為止，所有的可再生的能源技術、新能源技術與不可再生的能源技術相比，仍是不成熟的技術，中國沒有必要去當冤大頭，去幹枉費錢財的傻事。

最激進的歐盟也才設定了在 2020 年可再生能源佔總能耗比重 20% 的目標。這將意味著在更長的時間裡，化石能源依舊是世界能源最主要的供應者。化石能源這個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結合體，還會主導世界的能源供應，也會繼續排放二氧化碳。

國際能源署發佈的《世界能源展望 2007》證明，全球 2005~2030 年間，一次能源需求還將增加 55%，年均增長率為 1.8%。能源需求將達到 177 億噸油當量，而 2005 年為 114 億噸油當量。化石燃料仍將是一次能源的主要來源，在 2005~2030 年的能源需求增長總量中佔到 84%。而石油仍是最重要的單種燃料，儘管它在全球需求中的比重從 35% 降到了 32%。2030 年的全球石油需求量將達到每日 1.16 億桶，比 2006 年多出 3200 萬桶（增長了 37%）。從絕對數量上看，煤炭的需求量增幅最大，與近年來的飛速增長保持一致。在 2005~2030 年間煤炭需求量將上昇 73%，其在能源總需求中的比例也將從 25% 提高到 28%。使用量增長大多來源於中國和印度。天然氣的比例適度增加，從 21% 上昇到 22%。電力用量將翻一番，它在終端能源消費中的比例將從 17% 上昇到 22%。³¹

核電是一種清潔、安全、經濟、高效的能源，如果不出大事故，大眾對它是又愛又怕。

³¹ 易鵬：《低碳真相》第 188 頁。

截至 2008 年年底，全世界處於運行的核電機組 439 臺，淨裝機容量 3.74 億千瓦，其中中國在運行核電機組 11 臺，淨裝機容量 858.7 萬千瓦；在建核電機組 44 臺，淨裝機容量 3938 萬千瓦，其中中國在建機組 12 臺，淨裝機容量 1188 萬千瓦。目前，核電已經與水電、火電一起成為支撐世界電源的三大支柱。

與水電、火電相比，核電是一種經濟的能源。從投入產出分析看，建造核電站一次性投資很大。但是衡量核電站的經濟性，進行全過程、全方位的計算。對核電與煤電的成本進行比較發現：法國的煤電成本是核電的 1.75 倍，德國為 1.64 倍，意大利為 1.57 倍，日本為 1.51 倍，韓國為 1.7 倍，美國的核電成本早在 1962 年就低於煤電成本了。核電是新能源中唯一比煤電、水電成本更低的可再生能源。

發展核電有著鉅大的挑戰。最大的阻力來自民衆對核電安全的擔憂。核電在 1980 年代的歐洲國家迅猛發展，但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發生猛烈爆炸，反應堆機房的建築遭到毀壞，同時發生了火災，反應堆內的放射物質大量外泄，周圍環境受到嚴重污染，造成了核電史上迄今為止最嚴重的事故。使前蘇聯蒙受了鉅大損失。據前蘇聯官方公佈，這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 20 億盧布（約合 29 億美元），如果把前蘇聯在旅遊、外貿和農業方面的損失合在一起，可能達到數千億美元。同時，在核事故的危害下有 33 人死亡，三百多人因受到嚴重輻射先後被送入醫院搶救，有更多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輻射污染。為了防止進一步的輻射，前蘇聯將 28 萬多人疏散到了輻射區以外。

切爾諾貝利事件後，核電發展經常會遇到鉅大的民衆政治壓力。西方綠黨就是靠反對核電的遊行而脫穎而出的。中國的“綠運”有真誠的一面，也有不少人是添油加醋，興風作浪，誇大其詞，搬弄是非，借綠自高，倚綠弄財。所以現在的核電發展主要集中在中國和印度等亞太地區的新興發展國家。而歐洲的核電發展進入了一種相對停滯的狀態。在新能源規劃中，英國壓根兒就沒有考慮過核電。美國幾十年

來停止了新建核電站。³²

2011年3月初，剛剛發生的日本東北部九級大地震，福島核電站機組發生核泄漏，全世界對福島的關注甚至超過對日本地震、海嘯的關注，福島是不是第二個切爾諾貝利，事態仍在發展變化之中，人類憂心忡忡拭目以待。

儘管太陽能一直是被當作環保無污染的可再生能源重點發展。但事實上，計算能源的環保性不應該只看到產業鏈最末端其發揮作用的環節，更應該關注到製造光電過程中其上下游產業鏈的能耗、污染和排放。太陽能產業的核心是多晶硅，一千瓦光能需要十公斤多晶硅，製造這些多晶硅需要六千千瓦時左右的電能，排放超過40千克的有毒物質。按照每天發電八小時，每年工作250天計算，那麼製造這些多晶硅的電源如果要多晶硅本身來提供的話，需要其3~5年的淨發電量才能實現。但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光電的單位發電量固定資產投資是火電的2~3倍，光能發電的成本是火電的11~18倍，如果我們把固定資產增加的排放以及製造多晶硅時污染治理的排放、運營增加的排放以及產業鏈的其他排放算入光能發電的排放中，我們會發現太陽能的排放遠超傳統能源的排放。

還有，太陽能這種靠光轉化為能量的技術轉化率並沒有得到很大的提昇。絕大部分太陽能產品的能量轉化率一直低於16%，極低的轉化率導致了太陽能成本的偏高。以中國為例，最近中國國家發改委定的每千瓦時太陽能的價格是1.09元人民幣，遠遠高於單位火電和水電0.2~0.3元的價格。目前僅靠政府杯水車薪的補貼，太陽能發電量是難以大面積推廣的，這也是太陽能發展百年之後，仍在電能供應上遠遠不如煤電、水電、核電的最主要的原因。³³

風能也許是大自然給人類最大的能源恩賜。目前按在80米高度

³² 易鵬：《低碳真相》第190~191頁。

³³ 易鵬：《低碳真相》第192~193頁。

處每秒 6.9 米的風速來計算，全球風能可利用資源量為 72 萬億千瓦。即使只成功利用了其中的 20%，依然相當於世界能源消費量的總和或電力需求的七倍。所以，有鉅大的空間也就有了鉅大的發展。2007 年，全球風能累計裝機容量為 9412.3 萬千瓦，新裝機容量達到 2007.6 萬千瓦，較之於 2006 年的裝機容量增加 32.1%。風能裝機容量迅猛增長勢頭依然保持，2008 年達到 11881.2 萬千瓦，2009 年突破 1.4 億千瓦。

無獨有偶，和太陽能一樣，風電在產業鏈末端的發電環節是環保的，但回顧其產業鏈，我們發現風能產業在風機製造環節存在重大污染，從鋼鐵冶煉到污染極大的鑄造以及後續加工安裝，乃至風機每年一換且無法回收的潤滑油。

風電的成本偏貴，發電成本約是煤電的兩倍。這種高成本首先源自於其單位發電量固定資產投資高達火電投資的三倍。

其次，在於風葉片使用壽命也容易受外界環境的影響。在中國 2010 年“兩會”期間，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苗圩在參加湖北團小組討論時語出驚人：“國內紛紛上馬的風力發電廠大多是形象工程。”他認為我國風沙伴存，風電設備受風沙磨損大，上馬太多風電項目不符合我國國情。他進一步指出，再過五年，風電設備壽命肯定要出問題。苗圩同時認為，國外有風的地方沒有沙，比如海洋風，我國是有風的地方多有沙，風沙對風力發電設備磨損非常厲害。風能發電風機應該是 20 年的壽命，但如果有風沙的侵蝕，壽命則一定不足 20 年。風電設備壽命的縮短，無疑進一步提高了風電的成本。風力是不穩定的，風大風小帶來輸電網的運行十分困難，所以，風電又有垃圾能源之稱謂。

這些因素綜合起來，直接制約了風電的發展，所以在中國風電裝機容量是 1200 萬千瓦，但實際上生產的能量，只相當於五百萬千瓦的火電，在電力當中佔的比例，連 1% 都不到，幾乎到了可以忽略不

計的地步。³⁴ 當然，我國有漫長的海岸線，在沿海地區發展風電，還是值得肯定的。

20 世紀末，世界上有 24 個國家的 90% 電力來自水電，有三分之一的國家的水電比重超過 50%。

而中國能源總儲量的構成為原煤 85.1%，水能 11.9%，原油 2.7%，天然氣 0.3%；能源剩餘可開發總儲量的構成為原煤 51.4%，水能 44.6%，原油 2.9%，天然氣 1.1%。中國常規能源資源以煤炭和水能為主，水能僅次於煤炭，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事實上，中國也在水電發展上受益頗多。到 2010 年，全國水電裝機容量預計為約 1.94 億千瓦。水電的開發目前看起來很清潔環保，但同樣出面臨鉅大的挑戰。

最大挑戰來自環保的挑戰。中國三峽大壩是世界上最大的水電工程，確實發揮了鉅大的作用。三峽水電站替代燃煤電廠，相當於七座 260 萬千瓦的火電站，每年節煤五千萬噸。

但三峽大壩也導致了眾多的生態災害。2010 年的“兩會”上，重慶市副市長譚棲偉曝光，三峽庫區在蓄水 175 米後，已發生地質災害 252 處。同時，山高坡陡，石漠化現象突出，水土流失面積 48.6%。可見，凡事對立統一，有利有害，水電大建設伴隨著環境大破壞。但人類總不能回歸自然，重新刀耕火種，茹毛飲血。所謂利大於弊，將來，三峽工程的最大作用，是南水北調的建設基礎。

既然地球上所有的能源都是太陽能轉化，既然物質不滅，能量守恆，既然當前的新能源和再生能源技術仍不成熟，既然西方發達國家那麼希望我們少進口一些化石燃料多生產一些可再生能源。那麼，我們也不能搞“兩個凡是”，凡是西方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凡是西方反對的我們都要擁護。西方人吃飯不吃屎，我們不能專吃屎不吃飯。我們既不能坐失機會，貽誤發展，也不能一哄而上，一蹴而就，一著

³⁴ 易鵬：《低碳真相》第 194 頁。

不慎，滿盤皆輸。現在我們的風能、太陽能已經在全世界拔頭籌，還不知是禍是福。二百家生產電動汽車，全是西方技術，生產的電池，耗能高於燃油汽車，廢電池的處理，污染也大大高於汽車的尾氣。我們面對一種新趨勢的孕育期，應該一慢、二看、三通過、四引進最好最先進的技術、五在引進基礎上的創新，如我國的高鐵。

鄧英淘的新書《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躍遷》，其立場、觀點、方法都先進，舊的發展方式和工業化之路是以點塊聚集的不可再生能源為基礎，它是從減弱生物圈質能循環中獲“利”，這是少數人發達和現代化之路，對於多數人來說，這是一條死路。新的發展方式和工業化之路則要從加強生物圈質能循環中獲利，它是以分佈式可再生能源為基礎，是中國及世界大多數人發達和現代化之路，此乃數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或可謂之。鄧英淘經過多年的調查、研究、分析與大量的數據計算，得出了石破天驚的結論：

綜上所述，至 21 世紀中葉，水電、風力和生物質能三項總計，可更新能源生產量約合 37 億噸標煤，在 64 億噸標煤（16 億人口，人均四噸標煤）中所佔比例為 57.8%。至 21 世紀末，水電、風力、生物質能和太陽能四項總計，可更新能源約合 78 億噸標煤，佔 80 億噸標煤（16 億人口，人均五噸標煤）的 97.5%。也就是說，展望今後 50~100 年，我國的能源供給完全可以建基於可更新能源之上，且在技術上不存在顛覆性的障礙。

這是不是一種暢想？且看下述佐證：歐洲可再生能源委員會和綠色和平組織近日發佈研究報告，預計到 2050 年全球一半的能源需求將通過可再生能源來滿足。通過取消政府對化石燃料和核能的補貼，建立更有法律約束力的全球可再生能源的目標，為可再生能源投資者提供穩定的回報等，報告稱：如嚴格執行這些措施，可再生能源利用前景將十分可觀。節能後，可再生能源將能夠滿足全球一半的能源需求；核燃料將完全被淘汰，化石燃料將僅用於交通部門；全球 70% 的電力和 65% 的熱力供應將來自於可再生能源；溫室

氣體排放量將從 2003 年 230 億噸降至 115 億噸，能源成本將保持目前的水平不變。³⁵

包括鄧英淘所提出的“大西線調水”，都是超前先進的，大方向政治正確。其背後的潛臺詞與筆者的一個判斷，“先有帝國主義，後有資本主義”契合。帝國主義開疆裂土，瓜分世界，爭奪生存空間，窮兵黷武，爭奪的是市場和資源。但如果人類新的發展方式以可再生能源為基礎，是中國及世界大多數人發達和現代化之路，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的基礎就喪失了，中國從物質基礎上就篤定走社會主義之路。

但遠水不解近渴，中國水資源短缺是一個致命的剛性約束，且日漸顯現。中國水資源只佔世界的 6.5%，人均是世界的四分之一，但消耗量佔世界的 15.6%，生產了世界 25% 農產品，過渡抽取地下水，生態災害日重。西方說的和做的不一樣，比如美國，已幾十年不發展核能源。

在這方面，我更同意劉源上將的觀點：可控核聚變技術的成熟、替代第三代的核電站，生產安全核電還要 30~50 年的時間。中國的南水北調也要先易後難，先少後多，逐成系統，逐步發展為大西線調水。中國還蘊藏世界第一的煤炭資源和煤層氣資源，如果石油美元的惡果繼續蔓延，美國佔便宜既沒商量也沒夠，中國煤液化前景更可觀。現在技術和成本已不是問題。中國的海水淡化，通過鹽化工的中介，已經可以盈利。中國雖然缺水，但水能資源世界第一。我們可以斷言，中國現代化，能源不是大問題，篤定不走老帝國主義之路！總之，我們相信前途光明，但道路曲折漫長。西方的饋贈“強國夢”，我們還要夢下去，但三招兩式就能改變中國發展方式，從身板極差，到中國第一，我不信。

³⁵ 鄧英淘：《新能源革命與發展方式躍遷》第 11 頁。